

俱乐部活动

空难的发生是否与高龄客机有关?乘坐飞机是否真的安全?小鸟撞机是否会机毁人亡?4月12日下午,文汇报讲堂核心俱乐部会员走进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所在的虹桥基地,参观虹桥维修现场和维修控制中心一探究竟。

飞机如何“体检”和“退休”

眼见为实 恍然大悟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去年12月7日正式挂牌成立,是东航集团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的系列重大部署之一,开创了国内航空公司独立运营民航维修企业的先河,同时也标志着东航技术正式向“成为国际一流、亚太领先的飞机工程与维修服务商”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详细解答请扫二维码)

租赁到期“修新”退租



东方航空公司现运营商业飞机515架,其中自有飞机、融资性租赁飞机、经营性租赁飞机各占三分之一。我国往往是向国外飞机制造商承租新下线的飞机,租赁期10年左右。而在租赁期限届满前,飞机承租方要按照租赁协议及出租方的要求,进行飞机退租检修,使其无论是在性能上、还是质量上都要基本恢复至租赁开始的状态。一般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前后有近百名的技术工人参与工作,退租费用为人民币500万元左右。

发动机遭遇鸟击



鸟击事件通常不会造成很大的事故。如果鸟撞到了飞机舷窗的玻璃或机翼,飞机的一切即时数据都会第一时间传送到地面,飞机降落后,马上会有维修人员根据提前做好的维修预案进行维修。小鸟撞到了飞机发动机,飞行员也能做到在一个发动机停止工作时安全降落。只是降落后要认真仔细地清洗发动机叶片上哪怕是一丁点的污垢或积碳。鸟击事件发生概率和危害最大的是起飞和降落的阶段,因此民航机场都配备有专业的驱鸟车。

航班内部覆盖WiFi



在飞机上利用WiFi实现“空地互联”是一项集高科技、技术改造、高安全性能于一身的综合性系统工程。目前,使用通讯卫星传输进行空地互联,是全球航空公司空中上网业务的主流技术模式。但国内与国外网络环境不一样,要共享存在一定屏障。东航从去年开始,已着手与中国电信联手,共同使用卫星通信技术应用于“空地互联”,同时,结合地球同步轨道通讯卫星实现空中上网。图为工程师为春秋航空公司改造首架机内开通WiFi功能。

(文汇报实习生 袁臻璐)

(上接第二版)仁之坚持带葛剑雄去看当年成府大街蒋家胡同,找到了3号顾颉刚先生的故居,告诉葛剑雄这就是当年《禹贡》半月刊的编辑部和禹贡学会筹备处。

最有趣的是葛剑雄笔下的现已110岁的周有光先生。1985年5月,葛剑雄随谭先生首次探望了周有光和张允和两位先生,谭先生去世后,每年拜谒的习惯依然保留。周先生的乐观和睿智给了葛剑雄深刻的印象。葛剑雄记得周老对他说:“我过了八十岁后,就认为,八十岁的周有光死了,现在的我是新生。今年是28岁。我很高兴自己又多活了一天。”周有光85岁离开了办公室,但在九平方米斗室中依然工作和思考,关注的却是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每次交谈的广度和深度,让年轻人自叹弗如。

既受前辈学者的风范熏陶,又得益于“不拘一格”政策,葛剑雄也以自己不俗的学术成就作出回报。他在“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领域的研究和著作都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而他所著的《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一书,从1989年初版后,不断被再版,1993年台湾版,1994年韩文版,2008年中华书局以增订版《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再度出版,2013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问世后多次重印。

1996年,葛剑雄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的任上,历史地理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01年,葛剑雄联合不同国家的学术团体,主持启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编纂开发工作。这套系统被认为是重建矢量化空间数据的重要手段,至今一直放在哈佛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的网站。哈佛常务副校长来访复旦大学时,便向王生洪校长提及历史地理研究所和这一项目,称这是复旦学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两个领域之一。而从2004年起,他还担任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至今。

说到这里,葛剑雄对记者这样评价顾颉刚、谭其骧和自己几代人的学问和抱负。“顾先生有倡导之功,但历史地理学是在谭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这一代的开拓下才形成学科的,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发展到了现代的历史地理。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地理又发展出不少新的分支,特别是历史人文地理,目前除复旦、北大、陕西师大外,武汉大学、西南大学、暨南大学、天津师大、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都有

了历史地理专业,历史地理学者也在更多的领域发表学术成果,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就个人成就而言,葛剑雄说,“我们个人难以超越谭先生;但是,就集体的力量而言,已经超越了上一代。”2007年,担任11年所长后,葛剑雄毅然在最辉煌时辞职,他说:我的创新工作已经做到底了。

“不拘一格”录用博士生

在谈到顾颉刚、谭其骧的共同点时,葛剑雄强调了两位前辈都善于听从不同建议和不自恃力提携后学。而葛剑雄承继“不拘一格”风格也颇具魄力。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讲师、全国百篇优博的获得者马孟龙,但他的本科毕业于市属院校的中文系,专业课和英语无法通过博士生考试,但是葛剑雄看好了他的学术研究潜力;写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著作上过《百家讲坛》、《子午书简》等栏目的张宏杰,只读过本科财经专业,曾经就职于银行的他却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番考察,葛剑雄还是决定将他“收入麾下”。目前,两人也如预期在专业研究中表现出众。对此,葛剑雄强调教育制度化有其优越性,但是也有局限性,需要特殊性来弥补,但是,他说,“这种特殊化的前提一定要出于公心,其次,被特殊化的对象自己需要警醒,好好努力用功,最后,万一一看错人,需要社会的包容”。他剖析了自己的优劣势,“像我没受过大学的系统训练,在知识和治学方面,都有不少缺陷。”他说,自己很少引用理论,也没有精力去尝试计量研究法。但是,对于学生,他还是严格要求他们接受规范的学术训练。“中国历史地理走向国际化,需要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

公共情怀中的“求真”和“有用”

强调“求是师求真”的谭其骧,有一句名言: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受着先师影响的葛剑雄对“求真”有着自己的表达方式。

用好专业知识来“求真”

在40万字的《悠悠长水》中,葛剑雄记载了谭先

生1986年坚持《中国历史地理图册》第七第八册“求真”的风波。有关部门指示图册按照内部本画,谭其骧觉得内部本明显有误,他最后表态,如果办不到,第七第八册后面取消主编谭其骧的字样。葛剑雄回忆了先师给当时正在美国哈佛燕京访学的他的信:现在毕竟不是“四人帮”时代了,我决心斗争到底。我若顺从某部门要求,我还能算个学者吗?这样的“斗争”又延续了年余,1987年12月,第七册出版,1988年12月第八册出版。从1980年开始修订,历时八年半终于出齐。而内部版则是1954年,毛泽东提议后,由吴晗牵头开始启动,其中一波三折,直到1978年才出版了八册内部版。而谭其骧为《中国历史地理图册》倾注了三十余年心血,终于成就了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学术财富和社会价值。

葛剑雄将“求真”也延用到了公共情怀中。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学者,如果不能对公共事务发表见解,就不能称为“知识分子”,“那他只是个专业人士或者学者。”但是,葛剑雄特别强调,要用专业知识来解释公共问题。

1990年代后期,《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引发社会热议。对民国大师的崇拜一时风靡。1998年,葛剑雄撰文《我看陈寅恪现象》,发表了诸多冷思考。首先,他指出,陈寅恪眷恋中国传统文化和接触到的西方文化,由此确立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追求,但是,由于无法实现,晚年便寄托于观念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源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情感和理智的失衡,当下现实无法让知识分子完全拥有独立的思想,就只能寄托于未来,并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接着,葛剑雄又分析,大家都看到了陈寅恪的见识和勇气,但还要有最高领导人的宽容,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谁能长期不参加政治学习,不上课,专心做自己的研究,又保持衣食无忧呢?对于陈寅恪被称为史学大师,葛剑雄指出,要对其学术成就给予客观评价,学问并非没有限度,贡献也只集中在某几个领域。就隋唐史研究,葛剑雄觉得,当前的水平整体要高于陈寅恪当年发表过的著作。最后,葛剑雄说,“大师要学习,但不要迷信盲从,更不要将他们当成神。”这样的论述频频见于葛剑雄的学术随笔中,比如《被高估的民国学术》、《永乐大典迷依旧》、《科举制度:存废皆有理》、《评<1421:中国发现世界>——兼论真实史料的重要性》等等。对于前人的评价,葛剑雄很少去刻意拔高,即便对于他的老师也是如此。他不止一次指出关于谭其骧见过毛泽东和林彪的说法都是

以讹传讹,并呼吁不要主观揣测加上这些“学术光环”。而对于当年顾颉刚埋怨谭其骧在他离京期间不能及时编出《禹贡》半月刊而导致歧见一事,葛剑雄曾在1980年谭其骧长时间拖延编辑部关于七大故都演讲稿的整理稿件时,追问导师,您当年是否也是这个速度编《禹贡》,谭其骧坦率地承认:差不多。

对于自己,他也同样。在论及境界时,葛剑雄认为有三层:第一是有信仰,第二有职业道德,第三符合等价交换原则。他说自己还谈不上有信仰,算比较有职业道德。

怎样更“有用”就怎样做

顾颉刚当年亲自编《禹贡》半月刊时曾这样说,“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但为了让更多青年人才成长,不得不办刊物,他说,“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要为某一学术的全部打算。”顾颉刚亲自编《禹贡》杂志,其“开风气者”之举确实壮大了历史地理学的人才队伍和影响力。

如果说谭其骧先生的求真,在葛剑雄身上某种程度上延伸为“有用”,那么葛剑雄如今的所为也颇有些大师顾颉刚的气魄——2014年2月从七年的复旦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葛剑雄更多地致力于普及讲座。他发现,许多专业人士认为的“常识”却是普通人的“新识”,如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时要注意有用原则一样,葛剑雄的逻辑是:“怎么做受益面更大,怎么更实用,就去抓紧做。”如今,葛剑雄普及讲座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在上海,最紧张时,往往一天排三场,但还是无法满足络绎不绝前来的请求。最后,复旦的老师也抱怨起来,为何不给本校学生演讲。

如果说,做先师的助手和文革的体悟让葛剑雄更深入阅读了人性和社会这本书,那么直接的成果就是加深着他对知难而退背后的中庸智慧的理解和实践,中庸即一种常人不易掌握的平衡,所以,在做学问、知世论人时,葛剑雄身上会闪耀着如谭其骧先生所说的“求是求真”风格;在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公共情怀时,也会有如大师顾颉刚一般的“开风气”的影子;而他的博闻强识和能言善辩的天赋,一口气游1500米,每晚只睡5.6小时的充沛精力,敢言有效的政协提案和为普及讲座的乐此不疲,又绘就了自己迟到的时代机遇。

这就是记者眼中的葛剑雄。